

《红楼梦》浅说

.417

云南人民出版社

I 267.411

《红楼梦》浅说

云南大学中文系七二、七三班

《红楼梦》评论组编写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二月

A476699

目 录

《红楼梦》产生的时代·····	(1)
围绕着《红楼梦》的斗争·····	(8)
《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	(16)
《红楼梦》揭示了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 及其必然灭亡的命运·····	(24)
《红楼梦》对孔孟之道的批判·····	(36)
奴隶们的反抗·····	(49)
封建社会的叛逆者——贾宝玉、林黛玉·····	(59)
贾府里的孔老二——贾政·····	(72)
贾府一霸——王熙凤·····	(79)
“克己复礼”的活标本——薛宝钗·····	(86)
“镇山太岁”——贾探春·····	(95)
出卖了灵魂的奴才——平儿和袭人·····	(100)
略谈《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106)
曹雪芹的生平和思想·····	(112)
怎样看待高鹗的后四十回? ·····	(119)

【附录】

《红楼梦》诗词选注	
好了歌·····	(125)
好了歌解·····	(126)

西江月二首·····	(128)
护官符·····	(131)
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判词·····	(133)
霁月难逢(晴雯)·····	(133)
枉自温柔和顺(袭人)·····	(134)
金陵十二钗正册判词选·····	(136)
可叹停机德(林黛玉与薛宝钗)·····	(136)
才自清明志自高(贾探春)·····	(137)
凡鸟偏从末世来(王熙凤)·····	(139)
红楼梦十二支曲选·····	(140)
终身误·····	(140)
枉凝眉·····	(142)
聪明累·····	(143)
飞鸟各投林·····	(145)
葬花辞·····	(147)
唐多令·柳絮·····	(152)
临江仙·柳絮·····	(154)
芙蓉女儿诔·····	(156)
后记·····	(172)

《红楼梦》产生的时代

《红楼梦》产生在十八世纪中叶，也就是清王朝的雍正、乾隆时期。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大约生于一七一五年（康熙五十四年），卒于一七六四年（乾隆二十八年）。在他生前七十来年，爆发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在他逝世后八十多年，又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这个被旧历史学家称为“盛世”的历史时期，恰好处于这两次农民大起义中间。这时期，阶级斗争风起云涌，空前尖锐，各种社会矛盾充分暴露，整个社会百孔千疮，病入膏肓，已是我国封建社会“运终数尽，无可挽回”的“末世”。

清王朝建立后，由于经过明末农民起义的推动，生产力前进了一步，社会经济得到了一些发展，出现过一個相对稳定的时期。然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这一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也不可能得到解决。清王朝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血腥压榨较以往封建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六四五年（顺治二年）春，清王朝正式颁布“圈地令”，开始了疯狂、野蛮的土地掠夺；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土地兼并更为严重。通过“圈占”及其他手段，土地高度地集中到官僚、地主手中，“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

（《清朝经世文编》）仅以江淮地区为例，一里内以一百户计算，其中十户地主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九十六点五，十三户自耕农

占全部土地的百分之三点五；而无土地的佃农竟多达七十七户。《红楼梦》中所写的荣、宁二府都拥有许多庄园，占有大量土地，正是当时土地兼并恶性发展的真实反映。

严重的土地兼并，使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流离失所。有的农民被迫投到贵族门下成为他们的农奴和佃户。掌握大量土地的封建统治阶级，便乘机向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十分残酷的封建租佃制的剥削。据历史记载，康熙时江苏的松江、华亭等地，每亩地产米最多不过二石，而佃农必须缴纳的地租每亩竟高达一石六斗。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象。《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写乌进孝交租，田租之高是相当惊人的。可见官僚地主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已经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

严重的土地兼并、残酷的经济剥削以及黑暗的政治压迫，使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劳动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于是，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自清王朝建立以来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康熙时期，有台湾朱一贵的大规模起义，有江西棚民起义。雍正八年，江苏崇明的佃农，反抗地主的增租。雍正九年，福建罗源、宁德等地农民闯入地主豪绅家里夺粮，前后达十四起。乾隆时期，即在曹雪芹死后不久，便有山东王伦的寿张起义和台湾天地会起义，等等。这些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猛烈地冲击着封建统治，加速着封建制度的崩溃和灭亡。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封建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清王朝的雍正、乾隆时期，虽然从当时总的方面看，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但自十六世纪已开始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

手工工场发展了，商业资本渐渐渗入并控制了部分手工业生产，实物地租逐渐向货币地租转化……从当时这个社会的外界情况来看，正在寻找世界市场的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已经在一向闭关自守的这个东方古老社会的墙外转来转去，只要一有空隙，它们便会蜂涌而入。在这种情况下，一六七五年（康熙十四年），清王朝只得放松了清初的“矿禁”。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又不得不承认“盗掘”的矿业合法存在，公开宣布开放某些“矿禁”。一六二三年放松了“海禁”，一七二九年（雍正七年）便大开“海禁”。在江南纺织业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七一二（康熙五十一年），清王朝只有放弃对江南各地纺织业机房中织机数目的限制（原来限制每个织房织机不得超过百张），并减轻了税额。到了乾隆、嘉庆之际，南京等地的纺织业已十分发达，南京全城的织机达到三万架。苏州、杭州已出现拥有千架织机的纺织工场。江苏镇江的一家拥有千架织机的纺织工场，有工人达四千人。

随着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许多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出现了。这也就扩大了劳动力的市场，使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流向城市。手工业工场的工人、工场主、商人及城市居民等等，就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而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封建统治，千方百计地压制和摧残处在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因此，在封建社会末期，便又产生了一组新的矛盾——市民阶层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市民阶层为了争得自己在社会上的政治、经济地位，摆脱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不断地对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政府展开斗争。清代中叶以后，市民阶层的“罢市”、“闹街”连续不断。“江宁、镇江、扬州等府百姓”就因为拒绝新督抚，于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十八、十九等日连日罢市”（《苏州织造李煦

奏折》)。乾隆十二年，山西万泉、安邑两县市民的“闹衙”运动，连封建地主阶级的头子——乾隆都惊呼：“近岁以来，科道官时有以民气渐骄为言者。朕初不信，仍戒饰之，乃福建则有罗日光抗租拒捕之案，山东则有张怀敬聚众毆差之案，江南则有王育英号召罢市之案，广东则有韦秀贞拒捕伤人之案，而莫甚于山西安邑、万泉，聚众抗官，守门索犯之弊为猖獗也。”

(王先谦：《东华录》乾隆十二年)这一系列事件中，“江南王育英号召罢市之案”和山西安邑、万泉两地人民的斗争，就是属于新兴市民阶层的反抗斗争。而这类斗争在当时是很多的。市民阶层的反抗和斗争，也同样猛烈地冲击着封建专制主义统治，是加速封建社会灭亡的一支新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共产党宣言》）清王朝建立以来，阶级斗争异常尖锐、激烈。正是这种阶级斗争，即主要是农民的反抗和斗争推动着历史车轮的前进，使我国的封建社会面临崩溃之势。在阶级斗争浪潮的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官僚派系之间，贵族势力之间，皇权与贵族、官僚之间的相互斗争日趋激烈。这种激烈的斗争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康熙末年诸皇子之间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一七二二年（康熙六十一年）康熙死，皇四子胤禛上台，改元雍正。他上台后用各种手段打击他的政敌，把与他争夺最激烈也最能笼络人心的皇八子胤禩囚禁起来；把与胤禛关系密切的胤禩拘禁起来，随后就把他们全杀了。接着，凡与雍正进行过争夺皇位的兄弟，接二连三地被谋杀，他们的子孙亲戚也皆获罪，有的被禁锢，有的被充军，有的被革职。平日追随这些皇太子的王公大臣，都同样获罪，无一倖免。另外，跟随他父亲的亲信和奴才

也在打击之列。前前后后曾做过六十五年江宁织造，和康熙皇帝有密切关系的曹雪芹一家，就是在这场互相倾轧的政争中败落下来的。这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是社会阶级、民族矛盾深刻化的反映，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一个侧面。它的意义就在于从封建统治阶级营垒的内部，加速了它的瓦解过程，同样说明了封建制度日益走向没落的必然趋势。

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里也有明显的反映：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封建正统思想与反封建正统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斗争也是十分激烈的。清王朝一建立，面对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形势，为了巩固它的反动统治，明确宣布：“国家崇儒重道”（《东华录》顺治十年）。还在一六四五年（顺治二年），清王朝就把孔老二捧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大力提倡宋明以来代表封建正统思想的程朱理学。乾隆时期，又接连下令纂修《礼书》和《三礼义疏》，屡次声称“礼”是“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的，离开了“礼”就不可能“总一海内，整齐万民”（《清高宗实录》卷二十一），并明确规定：在政治上必须“敦崇礼教，以端风化”（同上卷十九）。清王朝基本上沿袭明朝科举制度与八股文的考试形式。科举考试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主要内容之一，以孔孟之道为准则，借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束缚”一些汉奸士大夫，为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服务。清王朝还大力提倡远离现实政治斗争的学院式的繁琐考据学风，大力编纂《四库全书》，妄想以此转移人民的视线，忘掉现实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放弃反抗和斗争，以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与此同时，清王朝还大兴文字狱，用极端残酷的镇压手段控制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的思想，强化他们的反动思想统治。

然而，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阶级

斗争的推动及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的趋势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处于末世的封建社会的反动、腐朽的本质更加暴露，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它的怀疑和抗议。这个时候，清王朝反动、黑暗、严酷的思想统治不仅不能挽救封建统治的灭亡，反之，进步思潮却迅速发展，²并把它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统治思想——孔孟之道。特别是由于这一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新的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更使得这时的进步思潮多少带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色彩。

清初，正当孔孟之道的乌烟瘴气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就出现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他们在清王朝专制统治与民族压迫的环境中，坚贞不屈，激烈地反对皇权专制制度，反对孔孟之道，反对程朱理学，并且提出了男女平等，“工商皆本”的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具有唯物论、辩证法和初步民主主义的思想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要求。而曹雪芹也受到了这种先进思想的影响，他以自己的小说——《红楼梦》为武器，勇敢地参加了这场斗争。他通过自己小说中的人物，猛烈地批判孔孟之道、程朱理学，批判封建的宗法制度、伦理道德，无情地揭露了一整套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虚伪和反动，揭示了封建制度的衰朽和无可挽回的灭亡的命运。同时，热情地讴歌了叛逆者反封建正统的斗争精神……这些，都说明曹雪芹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曹雪芹的时代，封建制度已到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时候。所谓“盛世”，只不过是封建社会覆灭前的回光返照。此时的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社会

上的阶级斗争（包括市民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极其尖锐、激烈。《红楼梦》正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尖锐斗争的产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反封建的文学巨著《红楼梦》的产生，是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红楼梦》不但概括地、深刻地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叶封建社会的矛盾与危机，而且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曹雪芹还通过他塑造的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反对孔孟之道，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与婚姻自由的叛逆者的形象，鲜明地反映了当时新兴市民阶层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形象的阶级斗争史，是反映那个封建“末世”的一面镜子，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历史小说。

围绕着《红楼梦》的斗争

《红楼梦》既然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尖锐斗争的产物，那么，它一经出现，便立刻给予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积极的作用和影响。《红楼梦》对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的批判，对封建的宗法制度、伦理道德的批判，对一整套封建制度的虚伪性和反动性的无情揭露，对叛逆者反封建正统的斗争精神的讴歌，以及它所揭示的封建社会无可挽救的灭亡趋势……这一切，使封建统治阶级大为震惊。因此，《红楼梦》一问世，首先就遭到清王朝统治阶级的极端仇视，明令把《红楼梦》列为禁书。但《红楼梦》没有被封建统治阶级禁尽烧绝，它在社会上的流传反而“迫于海内，家家喜阅，处处争购”（《梦痴道言·前言十二年刊本）。《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引起了广大群众思想上的强烈反应，而且在一些封建文人中也形成一种“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风气。然而，各个阶级、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待《红楼梦》的看法和态度却显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这样，自《红楼梦》产生以来，围绕着《红楼梦》的研究便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旧红学派”，一般指自《红楼梦》产生到五四运动以前

的一百多年间的《红楼梦》评论和研究者。尽管他们的意见纷纭复杂，五花八门，但都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以主观猜测代替科学的文艺批评，大搞牵强附会的考证，割裂原著的精神，歪曲《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甚至对《红楼梦》进行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他们有的说：“淫书以《红楼梦》为最”（陈其元：《庸闲斋记》）。有的说，《红楼梦》的“危险性”“甚于刀兵水火盗贼”，主张“一火而焚之”（齐学裘：《见闻随笔》）。有的歪曲《红楼梦》的思想，说它是宣扬孔孟之道、儒家理学的书。一九〇四年，号称“国学大师”的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把《红楼梦》诬蔑为一部厌世主义的，寻求“解脱”

“出世”的书。“旧红学派”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文人们，散布这种种谬论，其目的是为了掩盖《红楼梦》所揭露的封建社会的矛盾与危机，掩盖罪恶的阶级压迫，从而麻痹人民的斗争意志，反对人民起来革命。正因为如此，汉奸、卖国贼汪精卫也曾借此大力宣扬其反革命的政治主张。

“索隐派”是“旧红学派”中的一个流派。所谓“索隐”就是探索作品有没有隐喻暗指的史实。“索隐派”中有人认为《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有的认为《红楼梦》是写康熙的宰相明珠的家世；还有的认为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指清之失”，等等。尽是一些荒唐无稽的唯心主义谬论。

“新红学”是指五四运动以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人们唯心主义的《红楼梦》研究。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得到更加广泛而迅速地传播，我国革命开始进入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阶段。正当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的时候，地主资产阶级的买办文人胡适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他大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动口号。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破坏广大青年参加革命，胡适大力提倡所谓“整理国故”，并炮制出《红楼梦考证》等文章，说什么：“《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

“《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猻散’的自然趋势。……《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红楼梦考证》）胡适竭力掩盖《红楼梦》所蕴藏的、指向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思想锋芒和批判精神，完全抹煞了《红楼梦》所反映的阶级斗争内容和预示封建制度必然垮台的典型意义。

胡适之流的所谓《红楼梦》“研究”、“考据”的目的是什么呢？胡适直言不讳地说：“我的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都只是用一些‘深切面著明’的实例来教人怎样思想”，“千言万语，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原来，胡适是以《红楼梦》“研究”为手段，宣扬反动的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反对日益广泛传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毒害广大革命青年，反革命面目真是昭然若揭。

俞平伯是“新红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他对《红楼梦》的评价，与胡适完全一致。他说什么“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又说什么“《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是一部忏悔情孽的书”，什么“其用亦不过破闷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此外，还有什么

“怨而不怒”说和“钗黛合一”论，等等。这些“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胡说，完全抹煞了《红楼梦》所反映的阶级斗争内容和巨大的社会意义，抹煞了曹雪芹对当时现实社会的批判态度，抹煞了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典型形象所代表的不同的阶级内容。这一切，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反动。

正当胡适、俞平伯大肆贩卖他们的“新红学”的时候，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先生对“新红学派”的反动的实验主义的唯心论及种种谬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针对“新红学派”所谓“自传说”，鲁迅先生明确地指出，作者一经把现实生活中的素材（模特儿）创造成为典型形象后，就“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出关”的“关”》）。鲁迅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新红学派”的“自传说”是妄图取消《红楼梦》里贾宝玉这个典型形象的社会阶级内容，掩盖《红楼梦》的反封建正统、反孔孟之道的思想锋芒。鲁迅先生痛击了“新红学派”根本否定《红楼梦》的重大社会思想意义的谬论，指出：“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的这个评价，是对“新红学派”的严正批判。……总之，在《红楼梦》问题上，鲁迅先生与“新红学派”进行了坚决的、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场斗争反映了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资产阶级右派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围绕着《红楼梦》研究所

展开的斗争也没有停止。

五十年代初，在刘少奇、陆定一、周扬一伙文艺黑线的包庇下，俞平伯换汤不换药地把他二十年代的旧作《红楼梦辨》改名为《红楼梦研究》抛了出来，在原来的旧观点之外，又增加了什么《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什么曹雪芹对四大家族之一的贾府“赞美”和“批判”的意思“都有一点”，什么《红楼梦》继承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春秋》的传统等谬论。继续歪曲《红楼梦》，继续贩卖胡适的烦琐考证，继续散布唯心主义。而刘少奇、陆定一、周扬一伙却称赞说：“《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等等。因此，胡适派的反动唯心主义和实验主义的烦琐考据之风又开始泛滥。

正当“新红学派”同刘少奇、陆定一、周扬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融合起来，继续对抗马列主义、对抗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的反动唯心主义思想的伟大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了。

一九五四年五月到七月，李希凡同志等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批判了俞平伯的错误观点。刘少奇、陆定一、周扬一伙却百般阻挠和压制革命的新生力量，抗拒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

在这种情况下，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

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²⁴《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这封信里，毛主席尖锐而深刻地批判了以“大人物”自命而镇压对资产阶级进行批判的“小人物”的“某些人”。

在毛主席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的光辉照耀下，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批判胡适派唯心主义的斗争全面展开了。从一九五四年十月开始，这场斗争持续了将近两年，取得了很大成绩，给予资产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在这场斗争中，刘少奇、陆定一、周扬一伙千方百计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一方面力图把这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引向“纯学术”的讨论；另一方面搞一些假检讨蒙混过关。在刘少奇、陆定一、周扬一伙的文艺黑线的庇护下，“新红学派”阴魂不散，俞平伯也继续坚持和散布他的错误观点。一九六二年，“新红学”又死灰复燃，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又盛行一时。

此外，在一九五四年以后，正当国际修正主义思潮泛滥之际，在《红楼梦》研究的领域里，又出现了一股修正主义文艺思潮。出现了所谓贾宝玉、林黛玉的典型“共名”说、“爱情主题”说。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外衣，贩卖的却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摧毁了上层建筑领域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七日，毛主席的《关于